

化，并在不断经历的国际危机中最终走向全面战争。

与之相比，在印度支那的案例中，崛起的苏联试图挑战美国的霸权。苏联和美国的内部文件表明，双方分析彼此互动时均依据多种意识形态框架。苏联将其盟友与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同时视为共产主义—殖民主义斗争和美苏争夺世界影响的斗争。苏联既通过政治和物质的方式支持盟友推动“民族解放运动”，又密切关注美国军事政策的方式和强度。苏联既推动印度支那的“反帝革命”斗争，又防止地区冲突演变成美苏（核）冲突。与之相比，美国将苏联对盟友的援助视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同时，美国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非“铁板一块”。苏联及其盟友存在明显的民族利益差异。美国既要对苏联及其盟友采取军事遏制政策，又要利用苏联及其盟友的民族利益差异分化对手，更要防止地区冲突演变成美苏（核）冲突。因此，自1965年至1972年，苏联和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进行了激烈的竞争，并多次出现双方可能直接兵戎相见的危险。然而，在整个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双方均始终强调政治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必要性，且均努力管控美苏之间可能爆发的国际危机。

综上所述，崛起国和霸权国意识形态分析框架的单一性或多佯性及其排列组合是理解“中时段”权力转移结果的一把钥匙。作为系统性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不仅是决策者推行某种对外政策的动力或目标，而且是决策者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媒介，帮助决策者收集信息、简化情景并增强合法性。研究者在更微观的层次上理解意识形态对不同类别的对外政策的作用机制有助于增进人们对不同时间尺度下权力转移过程和结果的理解。

世界政治中的时间性与因果机制

叶成城*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从科学哲学到科学方法论等诸多领域都开始强调

* 叶成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因果机制的重要性。对于因果机制的定义有很多种，但基本都认为机制是一个过程。早期的历史传统研究以个案或者少量的案例比较为主，因而总体上都隐含了对机制的叙述，直到有研究者试图将定量方法研究设计的思维引入定性研究后，才出现以相关性来替代因果性、不重视因果机制的情况。在经历定性和定量的“两种文化”之辩后，比较案例研究开始再度“找回机制”。

在梳理时间理论演变的过程时，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况。早期的历史学研究隐含了对时间性的思考，试图给出事物发展的脉络、进程或总结它的各个阶段。时间性缺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即在比较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的初期，很多叙事缺乏时间感是因为它们把不同时代的历史案例压缩在同一个截面，然后用最大相似性进行比较，这反而因为时空情境的差异而违背了密尔原则。在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的“时间重要论”（time matters）^① 和“皮尔逊时间”^② 出现后，在世界政治研究中开始了“找回时间”的运动。

“找回机制”和“找回时间”的思路是相近的，两者都是试图揭示具体事件随着时间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时间性很重要，机制也很重要，然而还是较少有文献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讨论。此前的文章讨论了诸多时间状态类型所对应的因果机制，但是并未区分时间和机制互相影响的作用方向。^③ 因此这篇笔谈试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并将其分为时间性对机制的影响和机制所蕴含的时间性意义两个方面。

一方面，需要思考的是时间如何影响到具体机制的结果。如果将机制视作从原因到结果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中的诸多时间性就意味着时间对于结果会产生影响。具体而言，这种影响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时间可以作为机制的情境之一。情境可以看作机制发生的诸多时空背景因素的总和，因为这些因素过于复杂，比如包括地理禀赋、共有知识、宗教、文化和政治制度等，它们对于 $X \rightarrow Y$ 的过程影响复杂并且难以完全厘清，无法全部作为因果变量而更加适合作为特定的背景，因此可以将其视作 $X_{(t)} \rightarrow Y_{(t)}$ 。由于因果过程嵌入具体情境之中，单独的机制或因素并不能直接获得结果，具体的

^① Andrew Abbott, *Time Matters: On Theory and Metho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② Paul Pierson, *Politics in Time: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nalys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③ 叶成城、郝诗楠：《政治学研究中的时间性：因果机制与事件的时间状态类型》，《复旦政治学评论》2019年第2期，第205—236页。

结果是机制和情境所共同决定的。^① 情境本身并不直接决定自变量到因变量的结果，但是它影响到了互动的效果，例如同样的因素可能会因为所处的环境不同而具备不同的含义。^② 在情境 A 中，自变量 X 通过机制 M 产生结果 O_a，而在情境 B 中，自变量 X 通过机制 M 则会产生结果 O_b。地缘政治学就是一门高度受到情境影响的学科，以土地、工业原料或数据为生产资料的差异，分别对应农业时代、工业时代或后工业时代截然不同的地缘战略。一旦地缘战略出现时间错位，例如用骑兵对阵装备火器的部队或者用钢铁洪流来面对信息化部队和无人机，就容易出现地缘政治灾难。

第二，时间可以作为机制发挥作用的载体。机制发挥作用需要时间的积累，在数学上可以看成诸多随着通过特定机制在时间上的积累对结果产生影响，就像水泥需要时间来逐渐凝固形成建筑一样。在中文语境中，“时”经常同“势”共同表明了对格局和走势的理解，一旦趋势形成后，就会存在较强且短期难以改变的惯性，即“大势所趋”“大势已去”。除了财富这种明显随着时间积累的机制之外，在世界政治中，更需重视的是诸如权力、观念、制度等因素随时间积累的机制。当意识到这些因素通过存量而非当前状态对结果产生影响时，也许可以对大国关系、国家建设以及权力格局的理解带来部分启示。如果将霸权视作一种政治秩序随时间积累的结果（包括技术的积累、盟友体系的经营以及国际制度的“战略性约束”^③ 等），而非瞬时的政治经济实力，就可以发现霸权国衰落的速度时常比预期中更为缓慢。这种惯性也存在于大国心理机制中，例如大国之间矛盾的形成往往较为缓慢，源于一系列冲突、误解以及敌意的螺旋，在形成后很难依靠短期的缓和姿态来扭转，而这种“时间错位”又容易产生短期缓和措施无效的错觉。

第三，时间性对于机制的另一个影响是通过各类辅助机制干预最终的结果。因果机制可以理解为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干涉性过程。^④ 因果机制所展现的是一个

^① Tulia G. Falleti and Julia F. Lynch, “Context and Causal Mechanisms in Political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2, no. 9, 2009, pp. 1145 – 1151.

^② Gary Goertz, *Context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6 – 28.

^③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④ Alexander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04, p. 165.

因果过程，它在给定情境中仍然不能够带来确定的结果，因为过程可以被诸多辅助机制阻碍或干涉。时间概念本身没有因果含义，它需要与因果变量共同表达一种时间性以实现对机制的干涉作用，从而影响最终结果。具体而言，时间性包括了变量的先后、快慢和持续时间。^①首先，变量出现的顺序导致了结果的不同，例如发现资源在完善的制度之前还是之后会影响到资源诅咒机制的结果。^②其次，变量的节奏即具体的频率和速度同样会对结果产生影响。例如当大国对中小国存在领土要求时，改变边界现状的频率以及采取蚕食/鲸吞的策略，所造成国际社会的反应也时常是不同的。再次，变量的持续时间可以视作其相对时间的定积分 ($F_t = \int_{x=1}^x f(t) dt$)，例如一次战争未必会改变民众让渡更多权力给利维坦的意愿，但是长期而频繁的战火则会影响到这种意愿。^③

另一方面，需要思考的是因果机制中所蕴含的时间性。机制发挥作用，使得事物从原因到结果发生变化，这个过程会自然而然地展现时间性的特征。查看机制的时间性最通俗的比喻是类似股市的技术分析，可以通过不同的市场或心理机制来总结和对应它们在K线图中蕴含的时间形态。根据机制的时间特征，可以将其分为三种机制，分别是负反馈机制、正反馈机制和均衡机制。

第一，负反馈机制意味着一种减速变化。在负反馈机制中，阻力随着变化速率增加而增加。负反馈机制几乎是社会系统中最为根本性的机制，因为它是一种随着变化而自我衰减的机制，它的诸多约束效应使得机制输出的结果是收敛的，从而让事件或系统更加稳定和可预测。边际报酬和边际效用递减是一个典型的负反馈机制：对于生产者而言，单一生产要素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对于产出的增量是逐步衰减的；对于消费者而言，增加单位商品所获得的效用也是递减的。在世界政治中，国家对外扩张速度会因为遭到其他国家的制衡而逐步减缓，税率增加到特定比重后会因为抑制经济活动而导致增量的减少，等等。吉尔平认为霸权体系的扩张同样存在负反馈机制，霸权国的扩张会使其在

^① Anna Grzymala-Busse, "Time Will Tell? Temporality and the Analysis of Causal Mechanisms and Process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4, no. 9, 2011, pp. 1267–1297.

^② Terry Lynn Karl, *The Paradox of Plenty: Oil Booms and Petro-St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 217–221.

^③ Edgar Kiser and April Linton, "Determinants of the Growth of the State: War and Taxation in Early Modern France and England," *Social Forces*, vol. 80, no. 2, 2001, pp. 411–448.

统治期间的成本不断上升，一旦霸权国在进一步变革和扩张的成本和收益之间达到平衡，维持现状的经济成本的上升速度就会快于维持现状的经济能力，最终造成了霸权体系的衰落。^①

第二，正反馈机制的时间性特征是上个时刻的结果会成为下一个时刻的动力，从而呈现一种加速变化。因为社会系统存在诸多稳定机制，正反馈机制时常到达特定阶段后就会因为出现其他负反馈机制而达到均衡或衰减，因此它维系的时段通常比负反馈机制短。正反馈机制时常是打破现状的重要动力，例如市场机制维持了稳定，而市场中的恐慌机制则破坏了这种稳定，即特定负面情绪导致市场下跌，下跌又进一步导致了恐慌的情绪，从而形成了踩踏效应甚至引发金融危机。世界政治中也存在诸多这类机制，例如国家对于对方的敌意而招致更多报复时，就会进一步增加敌对行动，不断上升的敌意螺旋就会导致冲突升级乃至失控。国家间竞争中的许多前期优势存在正向反馈，因而就出现强者恒强的报酬递增机制，例如国家将扩张所获得的资源用于增强实力和进一步的扩张，就在短期形成了一种报酬递增的“马太效应”。这种报酬递增在地理区位、技术演进和制度变迁上广泛发挥作用，大国关系中的报酬递增机制相应体现在大国间地缘竞争、技术竞争和国际制度竞争中。^②

第三，相对于加速或减速变化而言，均衡机制则意味着匀速变化或不变。参考牛顿第一定律，均衡机制意味着达到正负反馈机制之间的平衡。也正因为均衡机制的存在，许多现象都不是 X 和 Y 之间存在简单的正相关，在各类系统中会出现更为复杂的“多重系统效应”。^③ 因为在真实世界中，很少出现仅有 X 同 Y 相关，并且它们同其他因素之间不存在关联的情况，实际情况是 X 的增加对 Y 起到的作用是同时至少存在两种不同方向的机制。例如在现实世界中的物体从高处落下，速度并不会随着高度增加而无限增大，因为速度越快受到的空气阻力就会越大，最终达到均衡时会出现“收尾速度”。价格机制是一种均衡机制，当价格高于或低于实际价值时，会以低买高卖的方式趋向“价值回归”。在世界政治

^①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56 – 185.

^② 田野：《大国竞争的根源：基于报酬递增机制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第85—103页。

^③ 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中，扩张规模通常也会实现一种正负反馈机制的动态均衡，一种是以战养战和优势积累的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另一种是地理等诸多因素带来的投送能力的距离衰减，两者达到均衡之后就实现了短期相对稳定的规模。

总体而言，讨论机制的时间性有助于理解复杂的事件和因果关系，时间性通过机制所处的情境、节奏、顺序、时段等诸多时间要素对于政治社会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而机制也会通过正反馈机制、负反馈机制和均衡机制等诸多方式产生事件的各类时间形态。当然，充分理解政治社会的因果关系还是离不开具体的案例比较分析，仅仅从方法到方法的讨论时常会面临实际操作中的不适应，更加务实的做法是同步或交替进行具体案例研究来结合方法论思考，从而实现比较案例研究中的“学”与方法思辨中的“思”相结合。

伯罗奔尼撒战争与斯巴达和雅典 战略规划中的时间缺失^{*}

莫盛凯^{**}

时间是战略规划的内在要素，也是以往战略研究往往忽视了的维度。战略规划的时间维度是指战略目标在多长时间里达成或者维持。它是“知己”与“知彼”间的一个桥梁，沟通两者形成一个完整的战略目标。徐进认为，战略目标与时间的耦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帮助决策者确定合理的战略节奏和制定相应战略步骤，没有时间限制的目标将导致执行者难以操作。^①

本文通过对伯罗奔尼撒战争两大主角斯巴达和雅典战前规划的考察发现，正是双方战略规划中时间维度的缺失导致了各自战略执行和操作的失败。除此以外，时间维度的缺失还导致了双方无法及时评估并更新各自的战略，而正是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际关系学院2021年度国家安全高精尖学科建设科研专项“伯罗奔尼撒战争与大国竞争的古典教益研究”（项目编号：2021GA0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 莫盛凯，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① 徐进：《时间维度与战略目标》，《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1期，第1—6页。